

西和文史资料

(此材料供参考)

第三十四期

政协西和县委员会

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五日



编者按：杜万鼎同志“祁山地名探源”发表后，曾引起关心西和史迹者的高度重视，现崔辛甫同志，又撰述了“祁山地望辨析”一文，我们本着“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现予发表，期望关心西和史迹的同志多提灼见。

祁 山 地 望 辨 析

——与杜万鼎同志商榷

辛 甫

祁山为陇蜀交通要冲，历来为兵家所必争。魏晋南北朝时，国家分裂，战乱频仍，祁山一带，更是战火连绵，尤以诸葛亮兵出祁山伐魏而名闻天下。但祁山究竟为今之何地，自古以来，众说纷纭，尚无定论。杜万鼎同志参阅大量文献，撰《祁山地名探源》一文（见《西和史志》第七期），对祁山地望作了考证，读后获益非浅，但按诸史

篇。觉得该文结论似有商榷之处。论源亦不能证成其说。因不揣鄙陋。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。以求教于万鼎同志和诸位方家。笔者学识有限。疏陋谬误。在所难免。望不吝赐教。

古代文献关于祁山的记载

自诸葛亮兵出祁山以后，祁山成了赫赫有名的军事要塞。故历代史籍对祁山均有记载。我们要考证祁山的确切地望，必须从辨析古代文献关于祁山的记载入手。古代文献关于祁山的记载颇多歧异。万鼎同志的《祁山地名探源》（以下简称《探源》），把文献关于祁山的不可记载，基本概括为三说。即：一、汉水（即西汉水）北祁山军说；二、汉水北祁山堡说；三、长道南祁家大山说。万鼎同志经过考证，否定一、二两说。肯定长道南祁家大山说。认为“屏风峡西岸的祁家大山是祁山王峰。”笔者认为，《探源》的这个结论，和文献记载牴牾之处甚多，经不起仔细推敲，是错误的。“祁家大山”祁山说为什么会错？我们先从古代文献关于祁山的记载说起。

最早对祁山作用明确记载的是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酈道元。酈道元《水经注》卷二十《漾水》注说：

汉水又西南，迳祁山军南，鸡水南出鸡谷，北迳水南县西北，流注于汉。汉水又西，得安川水入焉。其水出南山西北山白石戍东南。……得安水又东北，迳塞峡，其水出峡西北流注汉水。汉水北连山秀岑，罗峰兢峙。祁山在岷山之

西七十许里。山上有城。极为严固。晋诸葛亮攻祁山。即新城也。汉水迳其南。

《水经注》关于祁山的记载。不仅时间早。而且方位系本明确。并描绘了它的险峻形势。是考证祁山城址的主要依据。然而《探源》一文。把这一重要记载。轻为放弃以否定。认为郦道元把“祁山至”当作祁山。是“受魏化地名祁山军垒的影响。没有深究祁山的原生地名所导致的错误”。其实。郦道元的记载并没有错。错了的却是万鼎同志自己。正如万鼎同志所指出的。祁山。祁山至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二者互不能代替。同样。道元的记载也没有说祁山军就是祁山。祁山至和祁山。完全是两回事。可是万鼎同志对道元的记载却作了错误的理解。认为郦道元把“祁山至”当作祁山。这是万鼎同志来深究道元文意而导致的错误。从上述引文来看。汉水西流。先经祁山南。然后西流。再经祁山南。祁山军。在鸡水（即西和大柳河）的汉水处之北。以眺望之。即如今礼县祁山堡。山顶上称祁山。下通陇蜀通道。所以古时设军守也。因称祁山军。它不是祁山。非常明显。祁山在鸡水（即西和漾水河）在汉水处之北。如今礼县永兴北。它的形势。郦道元说是“连山秀岭。罗峰竞峙”。可见祁山并不是孤零零的一座山。而是南濒汉水。由南向北。横亘连绵。包括的地域是相当大的。因为它形势险要。所以魏晋以来。成为南北争夺的焦点。由此可见。郦道元对祁山和祁山军的记载。是十分明确的。分清祁山和祁山

军的区别，是对道元的误解。

唐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对祁山的记载，与《水经注》不同。该书卷二十二长道县条说：“祁山在县东十里。蜀主建兴六年，诸葛亮率军攻祁山，即此是也。汉水经其南”。按唐长道县，即今西和长道镇。祁山在长道县东十里，与《水经注》记载不同，当为吉甫之误。西和长道县东十里汉水之北，正是《水经注》的祁山军。吉甫未详考，据得传闻，把祁山军误为祁山，显然是错误的。但他仍认为祁山在汉水之北，不在汉水之南。由此可知，历史上以祁山军为祁山的，不是北魏郦道元，而是唐代的李吉甫。

宋元以后，人们对祁山的认识，又有新的看法。祁山所在，从汉水之北移到了汉水之南。王祝穆《方輿胜览》说：“祁山在长道县南十里，上有城，极其严密”。《通鉴》胡注也说祁山“在西和州长道县南十里”。《甘肃省通志》则好说并字，它说：“祁山，在西和县西北七十五里，其上筑城，蜀汉诸葛亮伐魏攻祁山”。这是说祁山在汉水之北，和《水经注》记载一致。但它又说：“屏风峡在西和县北四十里，宋郭思作祁山神庙碑，以此峡为正祁山”。（《甘肃省通志》文，转引自《探源》）这就又把祁山从汉水之北移到了汉水之南，并明确指出了它的郡望。《探源》一文，以上述诸说为据，肯定祁山就是今大峡峡（古时称塞峡，又称屏风峡）西侧的祁家大山。

综上所述，古代文献关于祁山的记载，尽管异说纷纭，但主要有

三说。这就是所谓元汉水北说、李吉甫长道东祁山军说、祝穆等人的长道南说。

祁山长道南说辨误

文献关于祁山的记载，如此歧异，我们究竟应以何说为是呢？《深解》经过考证，否定汉水北说和祁山军说，肯定了长道南说。祁山军不是祁山，已如上述，自应否定，而否定汉水北说，肯定长道南说，这却是错误的，何以见得？理由有三。

一、郦著《水经注》关于祁山的记载，既指出了祁山和祁山军的区别，又记载了祁山的具体方位和险峻形势，是现存关于祁山最早最详细的记载，是考证祁山地理位置的重要依据，没有充分的证据，是不能轻易否定的。此其一。道元是北魏时人，当时去三国未远，所记不会有错。而且南北朝时，南北斗争激烈，祁山既然是南北争夺的战场，烽火纷飞，道元不会对此毫无所知，当时人记当时地理，更不会有错。此其二。道元注《水经》，足迹遍天下，对山川水道，亲自进行实地考察，“因水以证地，因地以存古”，记载、考证翔实可靠，与书斋里的凭空臆想不可同日而语。此其三。道元学识渊博，历史地理知识异常丰富，《水经注》一书，繁征博引，采录古籍达四百三十多种，注释详尽，考证精审，在历史地理学上有不朽的价值。此其四。

有此四点，我认为道元的祁山汉水北说，是不能轻易推翻的。

二、祝穆《方輿胜览》、胡三省《通鉴》注关于祁山的记载，显

然沿袭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。如果说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《元和志》的长道“县东十里”被改为“长道县南十里”，这一字之差是怎么造成的呢？一个可能是，因辗转誊抄的缘故，“东十里”遂误为“南十里”。由于这一错误，遂使祁山位置从汉水之北移到汉水之南。另一个可能是，与宋代学者学风有关。这不是轻易怀疑古人。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论及《通志》、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二书时曾说：“杜、李两家书在处，只在律发瑕疵。其学之拘俗，则限于时代。又开赵宋气习，物理沿革冗乱，本易差讹，再加以后人好改前人旧说，则治丝而棼之矣”。（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九十）王氏对宋人学风的批评，无疑是正确的。胡三省学问渊博，尤精舆地之学，所究通鉴，被誉为“《通鉴》之功臣，史学之渊”。但对祁山的记载，仍引述祝穆之说。这是由于胡氏未予深考的缘故。总之，祁山长道南说，出现于宋代，其时去三国已远，历史陈迹，渺茫难稽，而学者们又不注重实地考察，好以异说相尚，因此，它是没有根据的臆测虚构，自然不可凭信。

三、《甘肃省通志》关于祁山的记载，也是引述以上诸说而成，抄录之功多，考证之功少，并无新意。各家之说兼收并蓄，即可说明问题。郭思《祁山神庙碑》以屏风峡为“正祁山”，究竟有什么根据，因原碑已佚，我们无从得知。然而，此碑既为神庙所立之碑，为趋胜求显，偶会之处一定不少，可信的程度也就很低，我们考察祁山眺望，当然不能以此为据。

总之，《水经注》关于祁山的记载是正确的，是考证祁山地望的主要依据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、《方輿胜览》、《通鉴》胡注、《祁山神庙碑》的记载则是错误的。

从古代战争看祁山位置

以上所述，仅以文献考释方面，辨析祁山长道南说之误，同时，考察古代在祁山发生的战争，对郾道元祁山汉水北说，更能提供有力的佐证。魏晋南北朝时，除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外，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，陇南战火纷飞，战争不断发生，考察这些战争的发展过程及进军路线，对于确定祁山位置，是最有说服力的材料。现将古代发生在祁山的战争，择其要者，简述如下：

一、马超反讨曹操之战。

建安十七年（二一二年），马超纠集氏羌，起兵反抗曹操，攻占汉阳郡治冀城（今甘谷南），杀凉州刺史韦康。韦康部下杨阜、姜叙等人合谋起兵，抵抗马超。战争不仅在冀城展开，而且波及祁山。关于这次战争的经过，史书有如下记载：

《三国志·蜀书·马超传》，

超果率诸戎以击陇上郡县，陇上郡县皆应之。杀凉州刺史韦康，据冀城，有兵众。超自称征西将军，领并州牧，督凉州军事。康故吏民杨阜、姜叙、梁宽、赵衢等，合谋击超。阜、叙起于卤，超出攻之，不能下。宽、衢闭冀城门，超

不得入。

《三国志·魏书·杨阜传》裴注引《烈女传》：

（姜）叙为抚夷将军，领兵屯历，欲拒以定。叙遂进兵入卤。（赵）昂、（尹）奉守祁山。超闻，果自出击叙，宽等从后闭冀门，断去路。过卤，叙守卤，超因进至历。历中见超往，以为叙军还，又传闻超以走奔汉中，故历无备。及超入历，执叙母，母怒骂超。超被骂大怒，即杀叙母及其子，烧城而去。

引文中的卤，即今礼县盐官，三国时称卤城。历，即魏晋时的历城，在今西和县城北。当马超叛曹以后，杨阜、姜叙、梁宽、赵衢、赵昂、尹奉诸人在历城商定讨超之计，姜叙率兵居卤城，赵昂、尹奉守祁山。马超听到杨阜、姜叙诸人兵起，遂从冀南下攻姜叙，因姜叙有备，超没有攻下卤城，而冀城又被梁宽等人所据有，马超进退失据，又攻祁山，“昂据祁山，为超所围，三十日救兵到，乃解”。（《烈女传》）马超围攻祁山三十天，因曹魏援救祁山之兵已到，祁山未能攻下，遂南下攻破历城，杀姜叙母及子，烧历城，然后南走汉中。

从马超与姜叙诸人交战情况来看，祁山当在汉水之北，与酈道元记载相合。祁山之东为盐官川，迥旋余地大。马超攻祁山不果，由此还可继续南下进攻历城。如果祁山是长道阻塞峡西侧之祁家大山，赵昂、尹奉在此守卫，控扼塞峡，马超未攻下它之前，绝对不可能南下

攻历城。这就说明，祁山必在汉水北，长道南之祁家大山根本不是祁山。

二、诸葛亮兵出祁山伐魏之战。

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，祁山成为魏蜀争夺的战略要地。魏明帝曾说，“先帝东连合肥，南守襄阳，西固祁山，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，地有所必争也”。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明帝纪》）诸葛亮北伐曹魏，曾两次兵出祁山。魏兴六年（二二八年），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，战事主要在今陕西境内进行，因马谡街亭之败，诸葛亮无功而还。魏兴九年（二三一年），诸葛亮第二次兵出祁山，魏明帝派司马懿西救祁山，魏蜀两军相持于上邽（今天水），两军交战情况，史籍有如下记载。

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注引《汉晋春秋》：

亮分兵留攻，自逆宣王（即司马懿）于上邽。郭淮、孙资等邀亮，亮破之。因大芟刈其麦，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，敛兵依险，军不得交，亮引而还。宣王寻亮至于卤城。

《晋书·宣帝纪》：

“（司马懿）适次汉阳，与亮相遇，帝列阵以待之，使持千金轻骑饵之，兵才接而亮退，追至祁山，亮屯卤城，据南北二山，断水为重围。

上述记载说明，魏蜀在上邽只有一次小战，司马懿便凭险固守。

不肯出山，诸葛亮为了引诱魏军，退军祁山，屯驻卤城，司马懿亦追至祁山，战事即在祁山一带展开，欲将张郃在木门（天水西南）中伏毙命，欲蜀交战的地点是祁山，诸葛亮坐镇卤城指挥，则祁山必在卤城附近，绝不会远在汉水之南。

三、北伐、刘宋争夺仇池之战

元嘉十八年（四四一年），仇池国杨难当倾国南伐，攻入汉、川，刘宋派龙骧将军裴方明讨伐杨难当，难当兵败，投奔北魏，魏军占领仇池，北魏以为杨难当复仇为借口，派古弼等人，兴师伐宋，于是在陕南发生了北魏与刘宋争夺仇池的战争，史载：

弼等从洋波山南入，与东道将皮豹子等讨仇池，遣永平侯贺道攻义阳郡峡道，守将姜道祖退守狭亭，洋波以山势险峻，时又雪深，用马不牢，皆迟留不进，弼独进军，使元齐、贺道等击狭亭，道祖南走，仇池平。（《魏书·古弼传》）

引文中的“峡道”，即峡城，因陕南交通古道必经此峡，故称此峡道，狭亭，又称峡亭、石营，即今西和石堡，“洋波山”不知所在，据《魏书·地理志》“洋波山”作“祁山”，文云：“诏安西将军、兴公古弼督陇右诸军及汉中虎贲与武卫王杨保宗等从祁山南入，征西将军、淮阳公皮豹子与琅邪王司马遵之等督关西诸军从散关西入，俱会仇池”。《宋书·索虏传》改作“安西将军、兴公吐奚爱弼（即古弼，《魏书·官氏志》，吐奚氏后改为古氏），率南秦王杨难当

自祁山南出，直冲长安”。据此，则“祥教山”当为祁山之讹。这个推测如果不误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古蜀的进军路线是：自祁山南出，首先攻打襄峡，刘宋守将姜道祖战败，退守决亭；古蜀又派元齐、贾死进攻决亭，道祖又败，向南逃走，官军降北魏，古蜀于是攻占仇池。

从古蜀进军路线来看，南北朝时期，祁山的地理位置，依然和三国时期一样，在汉水之北。如果以祁家大山为祁山，上相已成，将又作何解释呢？

结 语

通过以上辨析，可以作出如下的几点结论。

一、酈道元《水经注》对祁山的记载，符合历史实际，是正确的。祁山北望在汉水之北，属今礼县境，不属西和境。

二、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以祁山率为祁山，是错误的。故古时的祁山率，亦即现在的祁山堡，不是祁山。

三、《方輿胜览》、《通鉴》明注的祁山长道南说，亦属错误。故今西和境内的祁家大山不是祁山。

四、《甘肃省通志》两存两说，兼收并蓄，是不可取的。

一九八六年十月八日

西和文史资料

(此材料供参考)

第三十五期

政协西和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日



“贵台新村”地名的由来

朱天相

西和县汉源镇北川里有一片地，新取村名曰：“贵台新村”。取“贵台”为地名，也有它一定的历史意义。只是贵台的“桂”字，用成“贵”字，是别字之误，应该更正。“桂”是人的姓氏，“台”是对长官的尊称，因为该县在清代道光年间，有一位姓桂的县令，为官清正廉明，人民颂扬他的德政，为他树碑立传，铭刻其政绩于石碑，以垂千古，而作纪念，所以把北川路岔叫“桂台碑下”。

我记得北川里原小路口，有两座石碑，一座新的是何公（积枯）的“感恩碑”；一座旧的桂公的“德政碑”，后者立于道光二十六年（一八四六），距今已有一百四十年了。碑体虽矗立无缺，但碑边缘砖块已经剥落十几片。在每年春节期间，贴有很多对联和拜帖，香

烟鼠，似以庙宇。此碑于民国三十二年（一九四三）移藏教育馆“碑林”，“文革”中被损。

在民国《西和县志·艺文志碑记》中，载有桂公“德政碑”序，约有一千多字，摘录于下，供我县各界人士了解桂公在西和的政迹，和取“桂台”村名的由来。

桂公德政碑序

作者（阙名）

桂公名懋，字桐生，号德山，籍隶蒙古旗白旗。其父教占公讳恒，嘉庆己巳科进士，分发四川，暇宣多年，德行恩普，口碑载道。……公道光壬辰（一八三二）举于乡，乙未（一八三五）成进士，补授西和。道光二十四年（一八四四）莅任视事之初，即以亲民为已任，士俗人民，无不洞悉，凡兴利除弊，皆尽心竭力，以家邦为已任，而予民，毋慎端愿，察所好而除所恶，故惠泽由。……公甫下车，知有刁横之徒，骚扰地方，即严加惩治，强悍顿息，而平民遂安堵无虞矣①。首重农桑之事，经营周济，尽其力，田亩丰稔，而田野遂咸歌太平矣②。大辟径为安民之源，公巡警捕，宵小自是敛迹矣③。聚赌为身家之累，公密访严究，俗习随日迁善矣④。市厘纳有常经，较准斗秤以一之，凡贸易货物，不容以伪杂真，采贩奸利而诈虞之风泯矣⑤。奢侈攸关，世道躬行节约以率之，凡日用饮食，教以去华黜靡，一归质朴，而礼义之俗可兴矣⑥。公之宰治也，清心寡慾，内外严肃，左右不敢少有懈惰胥吏，不得弄其弊害，凡听措施，大小缓急，率皆以

民有为者循良之效。无事者间阎之福也⑦。公之强公也。尽信明决。剖新闻异。顽者不得肆其狡猾。富者无由用其请托。每析一狱是非曲直。无不判决循或者。始末抵家。颂德者声已载道矣⑧。书院路甚稠。膏火之费。公多方筹备。普捐廉俸。以振兴之。每月课士异之以修行立品。至其秀且良者。从优奖励。而文苑次之。士习蒸蒸日上矣⑨。一至至春开县。公躬亲勘验尺寸量。以劳心而兼力之劳。冒雨冲风。不惟辛勤。每遇邑中。既无漏税之弊。又无加赋之累且收⑩。公查县数月。车马仆从。书吏胥吏。俱系自备。听按乡风。毫不侵扰。间有以鸡黍款者。必从厚以偿之。斯真上则克裕国课。下则无妨民生矣⑪。斯邑民贫。公之来此。入不敷出。挹家资以啖垫之而恬淡自若。不饰器用。不务华饰。一切是心志玩。耳目非其情之所近。惟耽读书耳。公之暇即课诸生诗文。如不称意。则展纸即书一二篇。以为鞭策于人。则和平乐易虽少。忤意旨亦含容之不校。而公生明廉生醇正刚方之概。又凛凛不可犯焉⑫。……吾邑士民感戴德德无一非。似效芹献之私。而公一榻碎席之。岂容勒石刻名。以记其德之盛也。……固有所不忍者。爰括买迹。撰先闻或碑。以垂后云。

综上述碑序。文中总结出十二项显赫政迹。一是除暴安良。维持治安。二是重视农付业生产。三是打击盗窃犯罪。四是禁止赌博。五是校准斗秤取缔欺瞒交易。六是节约日用。反对朴素作风。七是约束部下。兴利除弊。八是处理民刑案中周详。以理公断。九是清廉俸禄。

兴教育，重品德，奖励优秀。十是不辞劳苦，亲登地亩，增加田赋，合理负担。十一是不扰民，不累民的好作风。十二是不讲排场，严以律己，以身作则，为人楷模。

下面谨抄录汪公的解组辞行诗二首：

阅尽繁华眼界宽，宦途劳瘁每心酸。西来三载感恩少，南去一时刻受难。偶忆渊明重策蹇，还嗤青禹久弹冠。故乡犹恋湖山好，步履犹游桂笏看。

临行留别众民

乍拂征衣去，求光动露晨。拥途争进酒，如别故乡人。功业成何事，三生亦夙因。飞鸢鸣未已，惭愧尔蒸民。

※ ※ ※ ※

西和县城内南街叫“南关”的由来

朱天相

各县城内的街道，都按方向叫街，如东街、西街、南街、北街。城外的街道叫关厢，如北关、南关、东关、西关。而我们西和县城内的南街，却为什么叫“南关”呢？根据老人的叙述这有它的一段来历。西和县在明末清初，城内居民很少，有的地方还没有修房子，由农民种庄稼。这个时期，城陷荒凉，加之屡遭兵燹，吴逆（三桂）的败兵，到处流窜，骚扰人民，致百姓不能安居乐业。

康熙壬寅年（一六六二）派来的县令叫董贞，是浙江海宁人。到任之后，有鉴于人民流离不安，即募工补修城垣，徙于居民于城内，移县官署于城中（即今政协地址），整修学宫（即教育行政机关），鼎兴文庙，创办义学。由于吴逆败兵到处抢掠百姓，加之当时的西和城居民甚稀，不予防守，故又从鼓楼东西筑起一条城墙，把鼓楼以南的人民都迁住在城中，以钟鼓楼洞子作南城门，由此把南街叫成了“南关”，当时流寇屡次攻城不陷，因而才保全了县城内人民的生命财产。后来秩序逐渐安靖，人民也安居乐业了，就把这一道临时城墙拆除掉，人民再移居南街，从此把南街叫“南关”的习惯，就永远传到了现在。二百多年来，代代相传，一直是这样叫法。当年得解放前曾把鼓楼南小学，改为“南街小学”，也没有改正过来，所以现在还是叫“南关小学”。

再说这个县令董贞是一位比较清廉执政的官，对地方很有政迹，后来歿于任所，一直无力归葬原籍，故留寓西和，后人感董公的德政，在姚家庙（今之检察院）建立祠堂以资纪念，即人民叫的“董公祠”。其后代业居城内东后街，现在董诚和是董氏的后裔。

* * * *

西和县西山崩入城内的具体时间

朱天相

西和县西山崩入城内，究竟是什么年代呢，其说法不一，有的说

是乾隆年代，有的又说是道光年间。其实都不正确。据民国《西和县志》记载，是清同治十二年（一八七三）农历八月十一日夜間，距今已有一百一十三年。因为那年入秋以来，阴雨连绵四十多天，雨量已经饱和，皇城烂湾早有裂缝，雨水渗入缝内，结合地下水，以致山坡滑塌，直崩城内钟鼓楼（即今之百货大楼和广场一九六二年拆除）而止，长约一百多米，面积达六千多平方丈，压塌民房七十二院，压死男女老幼八十余人，最严重的一家是庠生（秀才选补的）卢自振家，伤亡老少十一口人。城内富户刘三省慷慨乐施，以其家积存杂粮数十石分散给灾民作了救济。当时观音阶道道尹董文焕奖给“济困救危”的匾额一面，董道尹悲悼莫名，感而赋诗云：

“维十二月月在酉，惊闻山向西和走，山走非城城摧山，顷刻平街变陆阜，西南有声匝数来，撼动坤轴低昂久，崩涛怒疑江海沸，器器疾苦风霆吼，崖断树移拥街巷，湛埋毫蒿没户牖，可怜半城良家子，血葬泥沙身尘垢，踰垣凿壁行出逃，同时罹祸及鸡狗，糅错不复辨男女，姓氏岂能识谁某，天阴雨湿神电愁，哭声半夜高北斗，富者登时成贫寒，贫者赤身露臂肘，掘掘淤泥物偶存，得不一二忘八九，携妇抱子告无门，县吏倚皇窘束手，巡巡此方警可艰，耿司拊膺呼负负，二仪元气阴阳调，自然藏物真坤厚，兵戈方息水火灾，颠危坐视谁之咎，太华巨灵劈何曾，王屋愚公移岂有，高峰

~*~